

祖先来历的真实与建构： 鲁东南地区东海移民传说的解读

马星宇

摘要：地处鲁苏两地交界的鲁东南地区，普遍流传着关于祖先自元末明初由东海一带迁入本地的移民传说。东海移民传说从口头叙述到进入族谱再到进入地方志记载的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东海移民与本地社会历史的关系：一方面，与明代在该区域设置卫所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与宋代以来当地私盐贸易传统有关。而且，在明清易代之际，山东地区农业生产重新组合，大量无产贫民在获得了占有土地的机会、拥有定居权利的历史背景下，“祖先来自东海”的移民传说逐渐成为本地民众宗族建设的策略与地域认同的依据。

关键词：鲁东南地区；移民传说；宗族建设；地域认同

DOI:10.13370/j.cnki.fs.2024.06.005

利用移民传说考察人口迁移、祖先来历，探究移民、宗族与认同等问题，一直以来都为历史学者与民俗学者所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已从关注移民传说的真伪转向关注其被创造的过程与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①移民传说不单纯是某种历史真实的反映，其背后也蕴涵着人群的记忆与文化。同时，由于移民传说多见于族谱，因此对移民传说的探讨常与对宗族的研究结合起来，将移民传说置于具体的地方历史进程中理解，以此揭示地方社会的发展。^②东海移民传说曾广泛流传于明清以后的鲁东南地区，相关学者在围绕当地宗族组织的研究中，即对明初迁民传说建构与宗族发展进行了初步讨论。^③曹树基在关于洪武时期山东青州移民的研究中，利用地名志与当地族谱资料，说明明代山东地区的移民情况，并指出东海移民是山东移民的一个特例。^④但由于其研究重心在于揭示明代山东移民的情况，尚未对东海移民传说的形成与社会机制作进一步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鲁东南地区族谱为主要资料，结合前人讨论，探究东海移民传说形成的背景、长期存在于地方记忆中的原因以及与本地宗族建设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东海移民传说的几种文本

本文讨论的鲁东南地区指山东沂山以南、蒙山以东，东到黄海的区域，包括山东东南部莒县、莒南、日照、诸城、沂水、郯城在内的广大地区。区域内有山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貌，以丘陵为

作者简介：马星宇，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 ① 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袁铁峰、石凯月：《苗族的祖源传说与身份认同——以清水江上游清江村田氏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1年第4期。
- ② 刘志伟：《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7—329页。
- ③ 常建华：《近世山东莒地宗族探略——以民国〈重修莒志·民社志·氏族〉为中心》，《安徽史学》2014年第1期；宋华丽：《明清山东莒州的移民传说与宗族》，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④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2—186页。

主,南部为向苏北平原开口的扇形冲积平原。鲁东南地处鲁苏交界地带,其南部与苏北地区接壤,二者同属淮河流域,在历史与文化上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这一区域中普遍流传着东海移民传说,即先祖于元末明初自东海一带迁入鲁东南地区。“东海”即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云台山区。明代海州属淮安府,领赣榆县,清雍正二年(1724)升海州为直隶州,领赣榆、沭阳二县。由于该地与陆地相隔一道海峡,故在本地人的记述中也将其称为“海东”。当然,在民间关于东海移民传说的叙述中,“东海”并不是专指海州一地,而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代表着包括海州在内的南方地区。

今天能够看到的东海移民传说多存在于本地人的口头叙述、族谱与地方志中。相关的口头叙述也多与本地村庄来历有关。莒县上疃村的来历为,“明洪武二年刘、李两姓,从东海十八村迁此立村”^①。又有五莲县前逊峰村的来历为,“明初韩、徐两姓均从江苏省海州迁诸城县凤凰墩。韩姓先迁此,徐姓历三世又迁此”^②。

在口头叙述之外,东海移民传说大多是通过宗族祖先来历讲述的,因此相关叙述普遍见于本地的族谱中,兹举几例略作说明。莒州石匣村房氏在谱序中称,明代本地土地祠志中曾提到祖先来历:“始祖聚、莢公,于元之末年,群雄并起,干戈扰攘之际,黎民遑遑,奔走无路,因避世乱,兄弟二人相率由海东迁居于庄之南,曰桃树村,今之前庄,即其地也。后因子孙蕃[繁]衍,复迁于此,以姓名里,曰房家沟,载在天启七年《重修土地祠志》,可考。”^③日照田横寨魏氏族谱中记载的祖先来历为,“原籍海东,迁居照邑田横寨,以至于今云。夫吾氏渡海来迁之始,岂其尽居此土哉”^④。诸城王氏分为三大支,分别是营子、贾悦、相州,相传其祖先来自海州云台山。贾悦支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王桂琛朱卷履历表自称“原籍海州当路村”^⑤。而同作为诸城五大家族之一的丁耀亢丁氏家族,在其族谱中称:“当元之末,始祖讳兴者,以铁枪归太祖,从军有功,除淮安海州为百户,子贯世袭。自海州而徙琅琊,则自兴之次子推始。然则推,琅琊始祖也。”^⑥

在本地人的叙述中,他们也称自己的祖先来自“东海十八村”。如《侯氏族谱》中称其祖先明初来自“东海十八村”^⑦。对于这十八村具体指的是哪些村落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来自当路村的王氏称:“余王氏原籍江苏省海州芸台山当路村三槐堂,自洪武二年,兄弟七人由七老岭分袂迁居他处,各谋生产,吾始祖讳乙臣,迁居台头村,嗣由台头村迁居王家春生安居立业。”^⑧自赵家村迁至莒州的赵氏则称:“明朝洪武皇帝年间,赵氏枝[支]始祖自东海赵家村迁移到莒县南角六十里路赵家西楼安居。”^⑨还有自大村迁来的卢氏则认为:“卢氏之先出于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宅于滩头镇焉,职拜统制公,祖母何氏。宋时镇守东海,遂籍于东海之大村焉。”^⑩上述当路村、大村都在乾隆《云台山志》中有记载,当路村“去东海城北十三里,民灶杂居,其田多被潮洗。”大村,是本地人所称的俗名,地方志中

① 莒县地名志编审委员会编:《山东省莒县地名志》,内部印发,1984年,第200页。

② 五莲县地名委员会编:《山东省五莲县地名志》,内部印发,1990年,第66页。

③ 《莒县房氏支谱(石匣村)》第1册《本宗考》,莒县图书馆藏1951年抄本影印本。

④ 魏旒:《次修谱序》,《魏氏族谱(日照市碑廓镇田家寨村)》卷一,莒县图书馆藏1999年编修本。

⑤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53册,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3页。

⑥ 丁耀亢:《族谱序》,《丁氏家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三十年刻本。

⑦ 侯瑞清:《族谱序》,《侯氏族谱》,莒县图书馆藏1992年影印本。

⑧ 《三槐堂王氏宗谱(头台村)》,莒县图书馆藏1998年编印本影印本。

⑨ 《赵氏世谱(葛湖)》,莒县图书馆藏1996年抄本影印本。

⑩ 卢育生:《卢氏渊源谱序》,《鲁·莒·涝坡卢氏族谱》,美国犹他家谱中心藏2005年续修本。

记为“大义村”,“去东海北二十里,民灶杂居,谒云台者必由此村”。^①其余如赵家村等则未见记载。

尽管在莒州本地人的叙述和海州的地方志中都没有具体记述这十八个村落的具体名称和坐落位置,但是“十八村”这样的说法已经在地方社会中深入人心,成为一个符号,不仅在迁入地影响广泛,而且也影响了作为迁出地的海州。明代海州志中并没有这种所谓“十八村”之说,但至清代乾隆时修纂的《云台山志》中却开始采取这种说法,该志的《凡例》介绍本地名胜时称:“东海十八村,相传已久,自当志入。”^②在嘉庆《海州志》中也有“东海十八村,村村出贤人”^③等语。可见“东海十八村”的说法反向地影响着迁出地,这表明两地之间在人员的流动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十分频繁,迁出地流行的说法甚至被当地人所承认。

由于东海移民传说已经在本地广泛流行,于是这种说法也被载入方志之中。民国二十四年(1935)编修《重修莒志》时,在《民社志·氏族上》谈及该地的氏族时即指出:“今之诸氏,多于明初来自东海,以前皆无可考。”^④本地氏族被选编入《氏族》中的标准之一为“而无谱牒可稽,或世次未详者,概从略焉”^⑤。由此,族中有谱牒可查者,或家族世系详明者才有资格被记录。于是本地族谱中大量的东海移民传说开始呈现在修志人眼前,并被纳入方志的叙述中。由此,东海移民传说在数百年间已从口头讲述,进入族谱,又进入地方志的记载中。

二、东海移民传说的历史背景

族谱是东海移民传说的主要载体,而族谱中关于祖先来历的记述往往是虚实相间的,其真实性在于它投射了某种历史过程,因此进一步分析本地人关于东海移民的叙述文本,可以对其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作一番审视。东海移民传说在鲁东南地区的流行,固然可以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即鲁东南地区与苏北地区有密切联系,地理的近便与文化上的相似使得民众由东海迁入当地成为可能。但当我们回顾相关叙述时,可以发现这种叙述背后与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关键环节有关,因此上述解释似乎仍有未尽之意。

前文引述的族谱中关于东海移民的叙述多以明初为迁入起点,但并非所有叙述都如此,也有家族将其祖先迁入的时间上溯至宋金时期。如《海曲王氏宗谱》中记述道:

维我涛雒一族,原籍东海,海州镇总兵后裔,籍□当炉村,即凤凰村人户。嫡庶兄弟七人(师、谷、昭、庆、传、乐、仙),因避红军之难,收船涛口,登岸失散,时在大宋淳祐四年。长房、四房徙居莒境,六房徙居沂州,三房徙居安丘,二房徙居诸城,五房不知居址。我祖七公土著涛雒,于至元二年修立祠堂,建设天济庙,入灶户籍。^⑥

《海曲王氏宗谱》中对王氏祖先来历的故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部分,即王氏祖先的军人身份以及其家族中的灶户,这可能是鲁东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投射。一方面,与明代该区域设置卫所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宋代以来本地私盐贸易传统有关。有鉴于此,从东海移民的传说中,能看到莒州地区历史发展中对当地人群社会产生影响的两个要素:一是明代卫所设置与军户移民的到来;二是北宋以来本地活跃的私盐贩运活动。这二者影响着本地人群的历史记忆与叙述。

① 乾隆《云台山志》卷一《城村》,《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68册,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

② 乾隆《云台山志·凡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68册,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③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一四《建置考第三》,清嘉庆十六年刊本。

④ 民国《重修莒志》卷四〇《民社志·氏族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2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

⑤ 民国《重修莒志》卷四〇《民社志·氏族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2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

⑥ 王应骏等:《王氏家乘序》,《海曲王氏宗谱》,莒县图书馆藏民国二十六年石印本抄本。

明初在鲁东南境内陆续设立莒州守御千户所、沂州卫和安东卫,将其作为建立王朝秩序的方式之一。其中莒州所和沂州卫的设置是为了防守穆陵关^①,而日照县南设置的安东卫则是出于山东东部沿海“备寇”的需要。卫所的设立既收集无籍之人编入军队,也带来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卫所移民。日照族谱《海曲刘氏族谱》中对先祖定居日照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余始祖九原公,原籍江苏宿迁县,职指挥僉事。明洪武初,率两弟从汤信国公,沿海防寇,奉调来照,驻节安东卫,后又调赴三河县,世袭遵化卫指挥职,四传至启公,复调回安东卫,遂世居焉。康熙二十六年,汶以久厌兵革,后复由卫徙居杨家庄,课子耕读,忽忽十余年矣。尝思先世服务戎行,不暇文事,旧有谱牒,残缺不全,名讳俱在,而配氏多半失考,且户口渐多,生齿日繁,若不及时修谱,恐代远年湮,名讳亦皆失传。^②

由刘氏族谱的记载可知其迁入日照的基本过程:刘氏兄弟三人在明洪武年间跟随汤和在沿海防寇,奉命前来位于日照南部的安东卫驻守。随后,老大九原公调往遵化卫,根据族谱的记载其后代均驻遵化卫,至其曾孙刘启才于天顺年间调回安东卫,遂其后人定居安东卫。刘氏族谱中记载第六世刘希龙:“字君元,袭职指挥,防海攘夷,邑人倚为南边保障,钦加振远将军衔。”^③这一点可以在康熙《安东卫志》中得到印证,志列指挥同知五员,其中即有“刘希龙,三河县人”^④。

刘氏族谱中对祖先历史的记述称不上是信史,但其叙述大体反映了明初卫所移民迁入本地的历史线索。汤和是明开国名将,洪武十一年(1378)封信国公。洪武十七年(1384)倭寇侵犯沿海一带,明太祖将汤和、方鸣谦派往浙江一带,“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传岸”^⑤,明廷在浙江沿海设置卫所以及附属堡、寨等进行防御。汤和在浙江等地沿海建立卫所时曾“籍绍兴等府民四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兵,凡得兵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⑥。刘氏三兄弟应是在此时被充为军籍戍守于沿海各卫,以防倭寇。随后,这一政策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起开始在山东半岛实行,安东卫也是于此时设立。“洪武十有六年,日本陆梁出没剽掠,不可控制。始命信国公汤和,于东海诸边,延袤数千里,严设城堡,辖隶臬司,选练墩卒,棋布守御,倭寇始尔得戢。安东遂成重地。”^⑦

但是,山东沿海各卫设置时则与浙江一带情况不同。张金奎指出,山东沿海海防卫所建置时各卫所多未达到额定编制,主要原因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垛集征兵效果并不好,本省潜在军户资源短缺导致本地兵源不足,只能借助外省人口,于是才有了大批跨省军事移民的涌入。^⑧在安东卫等山东沿海卫所的建设中,必然会有来自外省的移民进入。因此,刘氏兄弟可能是在安东卫建立时,从沿海卫所调来补充安东卫的兵源,由此在本地定居。

刘氏族谱中讲述三兄弟入籍的过程与明初当地卫所的设置及其军户群体有关。其他家族族谱中也有相似的叙述,前文提到诸城丁氏也在族谱中称:“当元之末,始祖讳兴者,以铁枪归太祖,从军有功,

① 张金奎:《洪武时期山东沿海卫所建置述论》,张显清主编:《明史研究》第13辑,黄山书社,2013年,第139页。

② 《海曲刘氏族谱》卷首《初修支谱序(老长支)》,山东省莒县图书馆藏2011年重修本。

③ 《海曲刘氏族谱》卷首《老长支世系》,山东省莒县图书馆藏2011年重修本。

④ 康熙《安东卫志》卷三《职官》,本志由日照市岚山区教育局秦洪河标点整理,尚未出版,仅在网络上刊布全文。网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7be1d07bbb68a98271fefa8a.html>,访问时间:2021年11月20日。

⑤ 《明史》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3754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己丑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2799页。

⑦ 康熙《安东卫志》,《序》,本志由日照市岚山区教育局秦洪河标点整理,尚未出版,仅在网络上刊布全文。网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7be1d07bbb68a98271fefa8a.html>,访问时间:2021年11月20日。

⑧ 张金奎:《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万明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1辑,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32—47页;《洪武时期山东沿海卫所建置述论》,张显清主编:《明史研究》第13辑,黄山书社,2013年,第130—173页。

除淮安海州为百户,子贯世袭。自海州而徙琅琊,则自兴之次子推始。然则推,琅琊始祖也。”^①从丁氏与刘氏的例子中可知,安东卫中的许多军士是在卫所建立之初由南方,特别是沿海卫所一带调来,所以日照也就在此后成为了南方移民的迁入地,这背后与明初海防战略及当地卫所的设置密切相关。

前述海曲王氏的叙述还进一步提示我们,来自东海的移民也可能与灶户或北宋以来鲁苏交界地区的私盐贩运活动有关。北宋时,包括莒县、日照在内的鲁东南地区属京东东路密州,苏轼任密州知州时就注意到盐与当地社会民生的密切关系,他指出:“旧时孤贫无业,惟务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稀少……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②煮盐作为本地人的一种生计方式,逐渐成为私盐问题泛滥的源头,而私盐又与地方社会的“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从历史上来看,鲁东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产盐区,日照自北宋时起就有重要的盐场——涛雒盐场,年产盐三万两千余担。同时,作为迁出地的海州一带也是产盐区,“(临洪场)在海州赣榆之间,民灶错处,东滨海,西接赣榆民地,南抵海州,北连山东日照县界”^③。民灶杂处是海州地区的典型特点,由于两淮多盐场,这一区域也有许多灶户,海州一带也有许多百姓被划入灶籍,“丁男尽遣上灶煎盐”^④。尽管这里有板浦、徐渎、临洪三场,产盐颇丰,“沿河至安东商船无虑千艘,昼夜连络行不绝,其利可谓博矣”。但灶户却往往穷困潦倒,“一不幸有水旱之灾,而灶户先受其病,何哉?盖盐多而价廉,衣食仰给,计日而晒,未必足用也。加以官司之征敛,团长之侵渔,巨商之估算,又安得不贫乎?”^⑤灶丁在国家、盐商等层层盘剥之下,贫困难安,生活充满了艰辛,所以他们或是依靠余盐私卖谋生,或是弃产逃灶。并且鲁苏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与本地多山的地貌,使得这一区域成为私盐贸易泛滥、盗贼多发之地。

由此,私盐成为联结鲁、苏人群之间的纽带。北宋时苏轼指出:“沂州山谷重阻,为逋逃渊薮,盗贼每入徐州界中。”^⑥此时,本地一些无产流民便可以借山谷地形之便流动于鲁苏两地之间,成为私盐贩、劫掠的盗匪。涛雒与苏北一带均分布着众多盐场,这为两地私盐贸易与盐贩频繁地流动创造了条件。元代扬州人成廷珪《丁十五歌》讲述了丁十五的故事:“丁十五,一百健儿如猛虎,几年横行青海头,牛皮裁衫桑作弩。射阳湖上水贼来,白昼杀人何可数。将军宵遁旌旗空,倭甲蛮刀贼为主……官中无文立赏功,还向山东贩盐去。”^⑦“青海头”指江苏东海灌云一带,元为海州路。丁十五击败了这些水贼后,没有获得官府的奖赏,所以丁十五及其同伙继续向山东贩盐,由此可以推测丁十五等人是淮南的盐贩。

到明代时,鲁东南地区的山区关隘成为了“盐徒要路”,“(日照)巨峰寨在县西南七十里,莒州、邳、徐盐徒要路……沈疃集在县正西七十里,莒州界,盐徒贼盗小路。两乡集在县正北五十里,去九仙山锦衣卫口十五里,盗贼之路。红宁沟在县西北一百里,通安丘,小径盗贼出入之处,以上各委区长守之”^⑧。此外淮安府至海州、安东卫的陆路也是私盐流动的主要路线之一。明代徽商黄汴的《天下水路

① 丁耀亢:《族谱序》,《丁氏家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三十年刻本。

② 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55页。

③ 《两淮盐务考略》卷一《产盐之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41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三,洪武二十三年七月甲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3036—3037页。

⑤ 隆庆《海州志》卷二《食货志》,明隆庆六年刻本。

⑥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60页。

⑦ 成廷珪:《丁十五歌》,章蕙荪选注:《辽金元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87页。

⑧ 顾炎武:《山东备录下》,顾炎武撰,黄坤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748页。

路程》中提到淮安府至海州安东卫的陆路,其中几个重要的中转节点有淮安府—海州—板浦—安东卫,此路后补充记录道:“右路晚不可行,盐徒甚恶,夏有热疫,宜慎。”“淮北守支盐商,聚于板浦、新墟二场。”^①直到清初这里仍是来自南方的盐泉与匪藏匿之地,“因之莒州东连日照,南界江省赣榆,皆系产□之地,私盐较他处易于拦入,故当多设巡役严密稽查”^②。自北宋以来,鲁东南一带一直活跃着私盐贸易,且私盐贩多自两淮流域而来,这也印证了鲁苏之间的联系与两地的私盐流动有关。

由私盐在鲁苏之间的流动能够让人联想到人群的流动。雍正元年(1723)董氏族谱序言中称:“予董氏祖居海东,历世多年。自皇明洪武迁民,予祖威、镇兄弟二人始迁于莒,立业东关,耕读传世。”^③作于乾隆间的《严氏谱序》中载:“我严氏原籍海东人也,相传自大明洪武迁民,兄弟四人分居海、赣、沂、莒。来莒之祖吾不知其何名,始居之地吾亦不知其住何庄。传至都祖始居黄崖庄。”^④这些明初迁来鲁东南的家族的迁入路线与两地私盐的流向保持着一致。上文也提到元代时海州私盐贩往来于鲁苏交界的记录,明清时本地与周边州县、江苏赣榆一带联结的山路又往往是私盐流动的主要路径。由此,本地人称先祖自北宋即由东海迁入的叙述,也许并非无可依凭的想象,而是早在此前两地之间就通过不被官方允许的走私活动发生着联系。这些称自己来自东海的人,或许都与这些流动于鲁苏之交兴贩私盐的人群有关。

三、族谱中的东海移民传说

清代以来,鲁东南地区编修族谱活动逐渐增多。此时,东海移民传说也被普遍地书写进本地的族谱之中,这其中自然有本地历史变迁留下的痕迹。“祖先来自东海”已成为民众在建构宗族时的一种选择策略与地域认同,这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山东地区社会变迁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康熙《莒州志》中记载:“莒僻处海隅,东南一带尽多名山峻岭,先正未经阅履,不无遗漏。午未之变,有匿山中者,见其佳山丽水,始再增数种,以昭形胜。然亦不能尽录。”^⑤由此不难发现,鲁东南一带的丘陵成为人们避祸藏身的去处。鲁东南地区从事这种私盐贩运活动的人群不在少数,这就为两地之间“盐徒”的流动与隐匿创造了条件。同时,北宋以来本地从事私盐贩运的人群多为“无业穷民”,嘉庆《莒州志》中也将贩私之人描述为,“私贩之徒,大都无业穷民,苟图生计”^⑥。这些无恒产的“穷民”此后成为清代讲述、书写东海移民传说的主要人群,这与明清易代山东地区的农业生产重新组合的局面有关。

明清之际社会的巨大动荡,使得山东“出现了农业生产重新组合的局面”,大量土地抛荒,部分土地归农民所有,自耕农的广泛存在,对清代山东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⑦明清之际,山东遭到战乱的破坏,出现了大量抛荒的土地,此时出现了诸城人丁耀亢笔下的场景,“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乱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巨宅膏田,一无主人,任其侵占谁何,故前此所积,不可问矣”^⑧。日照地主厉宁在顺治时也曾向朝廷报告:“家有房四处,田四十余顷,坐落日照、诸城二县地方。因去年(顺治元年)四月,李闯伪官王良翰到县任事,拷诈良民,拿

① 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 天下路程图引 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

② 嘉庆《莒州志》卷四《盐法》,《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1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66页。

③ 董贵:《族谱原序》,《城阳董氏族谱》(一),莒县图书馆藏2013年编修本,第11页。

④ 严世哲:《严氏谱序》,《严氏谱志》,莒县图书馆藏2005年翻印本,第1页。

⑤ 康熙《莒州志·凡例》,《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7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⑥ 嘉庆《莒州志》卷四《盐法》,《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1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67页。

⑦ 罗仑、景魁:《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年,第15页。

⑧ 丁耀亢:《出劫纪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0页。

禁官绅。臣避闯南下,所有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小民瓜占。”^①从丁氏和厉氏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由明入清的过程中,由于时局的变化,山东的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改变,地权分配有了变化。对此罗仑、景甦指出,“地主贵族的土地,有的可能转到原来就在这土地上受地主剥削的佃农手中;有的可能转到以前是在这土地上耕种的自耕农,后来被排挤出土地的流民手中;有的则可能转到在土地兼并狂潮中幸存下来的自耕农手中”^②。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无产的贫民无论此前是何种身份,在此时都获得了占有土地的机会,成为自耕农,拥有了定居的权利。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既是财富的来源,也是社会地位稳定的象征。明代鲁东南地区的“穷民”借易代之际,占有大量抛荒的土地成为自耕农,在获得定居权之后,他们开始借助一些手段进一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编修族谱为手段来建构宗族;通过父系氏族关系来组织社会关系;通过团结同姓族人维护和强化对土地的合理占有权;等等。当地众多民众多与来自南部苏北的无产穷民与私盐贩有关,他们或是此前流动在山区中贩私盐的无产流民,或是与私盐贩运历史有关联。当他们通过编修族谱创造共同的祖先记忆时,东海就成为他们追溯的源头,“莒邑各大族姓,率云有明洪武前来自海东,盖元末大乱,英俊割据,干戈所至,蓬蒿遍野。莒地幅员辽阔,东濒黄海。或以土广人稀,流离至此,理有诸信”^③。五莲县《张仙王氏族谱》的谱序记载:“邇厥由来,非原籍莒人,海东当路村乃其旧居也。传自洪武迁民,自海东来兄弟七人。”^④此后,同治间张氏家族所立的《王氏碑谱碑阴》上也记载了王氏祖先的来历,“我王氏原籍江南海州当路村,自明洪武二年始祖迁莒,住张仙庄”^⑤。“祖先来自东海”借由家族内部的口口相传,通过族谱、谱碑等载体代代流传,共同塑造和传递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

此外,“祖先来自东海”的叙述能够在鲁东南地区进一步的传承与扩散也受到本地卫所移民的影响。由于沂州卫、莒州所、安东卫的设置,卫所军户在鲁东南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当地清代族谱中能够看到的几篇作于明代的谱序,均出自卫所军户家族。明制卫所武官品级较府县文官高,又因明初武官社会地位较高,以及宣德年间对武官犯法的袒护措施,故存在不少卫所武官、军士欺凌县民人之事。^⑥宣德年间在莒州即有一例,“有屯卒夺民田,为其所讼,得罪于按察司,卒仇之,而无以逞。夜盗民家驴以归,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为诬赖,擒送于千户孙恭,所千户与卒为亲,民被禁勘至死。法司坐千户以因公徒罪。公曰:‘杀以止杀,千户得生,则死者衔冤地下矣。’遂正其故勘之罪。山东人皆为之快意”^⑦。该案例说明在明初,作为军事移民的卫所军户在当地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所以当地卫所军官家族的谱牒修纂时间通常较早,在这些家族的族谱中,几乎有一半的家族都记述了其祖先自东海迁入本地的历史。科大卫认为,“霍韬、方献夫等在‘大礼仪’中支持嘉靖维护孝道的官员,同时也支持在地方上毁减‘淫祠’。这些官僚中有好几个是广东人。明中叶后,因为得到这些人的推动,家族制度在广东发展的特别快。其结果就是庶人(平常人的家族)可以像明初的贵族家庭运用同样的礼仪拜祭祖先”^⑧。由此可见,华南地区宗族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得益于士大夫的推动。对于士大夫群体力量微弱的莒州而言,卫所军户对

① 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年,第10—11页。

② 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年,第11页。

③ 吕凤来:《修族谱序》,《吕氏族谱(吕家固西)》卷一,莒县图书馆藏1998年编修本影印本。

④ 《张仙王氏族谱》下卷《修王氏族谱序》,莒县图书馆藏2008年编印本,第1806页。

⑤ 《张仙王氏族谱》下卷《王氏碑谱碑阴》,莒县图书馆藏2008年编印本,第983页。

⑥ 赵中男:《明宣宗司法活动述论》,吴艳红主编:《明代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8—260页;彭滢燕、杨园章:《卫所武官与明代温州地方社会关系探析——以明弘治〈重修温州卫治记〉释读为中心》,《浙江档案》2020年第1期。

⑦ 崇祯:《江阴县志》卷六《艺文志》,《无锡文库》第1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48页。

⑧ 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宗族的建设以及他们的叙述策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人建构祖先历史的方式。

如果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流布东海移民传说的主要地域为沭河左岸。这一区域多为丘陵,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却因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日照安东卫一带,相关的传说流传更多。由此,可以从侧面看出卫所军户对本地人叙述的影响。李仁渊指出:“族谱的编纂同时也是族谱概念的流传与接受。一部族谱从来不是一个宗族或宗族中的某个成员独立编纂出来的,编纂者必然看过其他族谱的范例,从他处习得运用文字的能力或取得文化资源。”^①所以,在卫所移民的影响之下,本地人在建构宗族的过程中也利用这种文化资源书写自己的历史,获得与当地历史的一种联结,找到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并且利用“东海”这一符号来塑造着地域的认同。

通过在族谱中书写祖先来自东海的故事,本地民众建构起了自己的历史。无论他们是卫所移民的后代,或是流动的“盐徒”,抑或是本地土著,他们都试图通过将“祖先来自东海”的历史写入族谱,塑造家族内部的祖先认同,并以此来建设宗族。这是清代鲁东南地区社会复苏过程中人群之间合作的一种方式,这种合作一方面与建构祖先历史及获得合法身份有关,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利用这样一种历史记忆建构着宗族组织本身,成为本地宗族发展壮大的基础。

四、结 论

人群的迁徙与定居、离散与聚合,社会的动荡与稳定,总会发生在历史的某一地区、某一时刻。正如东海移民的传说,存在于宋代到清代鲁东南地区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凝聚为习俗和传说、或说转化为习俗和传说的历史记忆,它反映了一种与征服者的历史记忆不同的状态,也反映了一种凝聚了特殊经历的地方性色彩。”^②东海移民传说最早出现在明末本地人的记忆或记录之中,普遍流行于清代中叶,它的出现反映了鲁东南地区人群的历史记忆,无论是来自南方的卫所移民,还是流动在鲁苏之间的“盐徒”,这些要素出现在东海移民传说中意味着该传说包含着本地历史某些真实的面相,反映了区域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即定居与地域认同的形成。

清中叶以来,族谱编纂对东海移民传说进行改编与记录,创造着本地的文化传统,这对于保存本地民众的历史记忆有重要意义。同时,“族谱的内容也是一种与自我认同(identity)和自我夸耀直接相连的东西”^③。自清代中叶以来当地大量的族谱都采取这样一种叙述,其中不乏对真实历史的附会虚饰,也有以此建立合法身份的动机。“东海”无论对于清代卫所的移民还是普通的民众而言,既是一种合法身份的表达,更是一种地域认同。而“祖先来自东海”的移民传说也使本地人群成为了共享同一文化资源的共同体。

[责任编辑 张 荔]

① 李仁渊:《从史料到文本——族谱与明清地方社会研究》,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第25卷,朋友书店,2015年,第97页。

②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③ [日]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教·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页。

largely ignored by the authorities. Wit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theft and chao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Xinhui, the special meaning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possessed by Yashan began to enter the official’s field of vision, an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fallen Song emperors and officials was also awakened by officials. From the Chenghua period to the Wanli regime, a complete belief system for the rulers and ministe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rough various practices of orthodox ritual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local clans also actively sought the identity of “loyal and righteous martyrs” for their ancestor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nating Millet to Serve and Rescue the King”(捐粟勤王), in order to obtain the possibility of worshipping the Yashan Temple. The families of Doudong Wu and Sanjiang Zhao not only deeply involved themselves in the management of Yashan Temple, but also regarded it as a symbol of compet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rights of tidal lands, enabling the lo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to be reconfigured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Yashan Temple; “Donating Millet to Serve and Rescue the King”; the legend of immigration

The Reality and Construction of Ancestral Orig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gend of

Donghai Immigrants in the Southeast Shandong

MA Xingyu

The south-eastern area of Shandong borders the northern area of Jiangsu. In this area, there are widespread legends of immigrants whose ancestors moved into the local area from Donghai in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Over centu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legends of Donghai immigrants from oral narratives to genealogy, and then to the records of local histories,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of Donghai immigrants wit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ocal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weisuo*(卫所) in this are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local private salt trade tradition since the Song Dynasty. At the time,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handong was reorganized, and numerous landless and impoverished people got the chance to possess land and the right to settle down. Under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cestors coming from Donghai” gradually became a strategy for lineage construction and a kind of reg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southeast Shandong; the immigrant legend; lineage construction; regional identity

Specialty Products That Are Not Known to the Locals: The Generation and Polarization of

Contrast Narratives of Specialties

ZHU Jiayu

At the beginning of 2024, the upsurge of specialty exchange of “Gift Exchang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sparked a carnival of “specialty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which gave birth to “contrast narrative of specialties” about local specialties. “Specialtie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are always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region. Differences in the mastery of relevant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s of the value of specific products can also form a distinction between locals and outsiders. In the “contrast narratives of specialties”, people have specific opinions about the products.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trast narratives of specialties” dilute the value symbols attached to specific products by the consumer societ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evelopment has produced new understandings and boosted people’s self-confidence and pride. However, emotion is also the factor that dominates the evolution of narratives, showing the most obvious growth trend, eventually becoming a “post-truth” knowledge that is more emotional than factual.

Key words: Internet folk literature; folk narrative; binary opposition; post-truth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Folk Literatur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GAN Lu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folk literature, having accumulated relatively matur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ults,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folk literature. Learning from the achievement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folk literature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collec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folk literature has not only consolidat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ext, but has also promote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animated films and theme parks as well.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and American folk literature has been reorganized and regenerated, a new genre of literature —urban legend, has been produced, upsurges of folk culture —fairy tale renaissance and neo-mythicism, has emerged.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should take this as a reference, to actively establish disciplinary confidence of folk literature, to make bidirectional effort both in academics and literature, to strive to break cultural barriers, and to innovatively inherit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